

第二章

政治社會化

Ben Rosamond

目次

- 緒論
- 政治社會化
- 政治社會化之目的為何？
-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 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

壹、緒論

人們如何學習到關於政治的知識？他們政治見解的源頭為何？乍看之下這些問題似乎顯得沒什麼大不了。可能會有人回答道，其實我們習得政治世界的源頭大多不脫那幾個料想中的東西；第一個躍上心頭的則非媒體莫屬(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等)。接著還有那些從比較正式的管道來學習政治的人(比方說本書的讀者們)。還有些人透過參與政治過程來學習政治。通常我們假定一開始要激發人們採取政治行動的話，必須要具備一定程度的政治知識，但是積極參與壓力團體與政黨等會使得政治知識有機會進一步深化。對那些從事公職的人來說也是如此，比方說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等。這類人士可以培養出政治如何運作的一套知識，且這種知識超乎一般公民所能企及。

然而，就像政治科學中大多數的議題一樣，人們如何學習政治的問題一點也不簡單。畢竟，究竟什麼才叫「政治知識」？僅僅只是知道一個國家的主要政治體制，知道主要政黨的黨綱與政見，並大略瞭解時下最主

要的政治議題為何而已嗎？亦或政治知識還含括了一套更為精密複雜的認知結構，關乎權威與人際關係，但不見得只適用於正式政治行動的那個世界？有沒有可能：我們心目中所認為的政治，其實和我們對家庭或職業生涯以及其他事物的看法息息相關？換句話說，人們如何學習政治以及什麼構成了政治知識，這是個可以被辯論的問題。

那麼讓我們回到最原本的那個問題：若我們問「人們如何學習政治」，那麼就表示我們預先假定了大家都同意有「政治」這回事。任何一個已經讀過本書緒論的讀者都會瞭解到這其實是個一點都不簡單的問題。除此之外，獲得政治知識的機制為何也是個廣受爭議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家庭乃是催生政治見解的溫床；另外有些人則認為是教育，還有些人會堅持說學習政治的過程會被生活中的各種經驗所大大影響。讓我們更深入地來看，還有政治學習上的心理學問題：與傳達和接收政治資訊有關的心理過程為何。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是：人們「何時」習得政治。之前的那些討論應該已經為主要的辯論軸線提供了一些線索。就根本上來說，辯論主要是針對以下兩件事：成人階段之前的經驗對鞏固某人的政治觀來說有多大的重要性，以及一生當中所遭逢的外在環境之變遷對一個人來說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

本章企圖透過反思政治學家處理如何獲得政治知識和政治觀這個問題的方式，來對這些問題加以抽絲剝繭。我們以政治學習的章節作為這本內容豐富的書籍之開頭，這其實是個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畢竟，我們事實上可以從討論政治制度開始，或是分析幾世紀以來主要的政治思想流派。但是以政治學習或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的議題作為開始，給讀者一個反思自身社會化經驗的機會，以及讀者自己的政治觀和政治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sation)

人們學習政治並獲得政治價值的過程(或是很多過程)。關於哪些過程很重要，以及最重要的社會化發生在生命中的哪個階段等，這些都是爭議眾多的問題。

經驗。此外，這也有助於強化我們在緒論中已經指出的重點，也就是政治現象不必然僅限於政府、國會與政黨所佔據的那個世界。

貳、政治社會化

政治學家在本章一開頭所大略討論到的那些辯論當中，通常都會使用「政治社會化」這個詞彙。政治社會化是個重要的概念，因為人們並非天生下來就具備政治知識。我們並非天生就對政治傳統知之甚詳。我們在社會中的政治生活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個別所持有的政治觀等，也都不是由基因所預先決定好了的。因此，正如拉許(Michael Rush)所說的：

我們可以如此定義政治社會化：它是某個社會中的個人逐漸認識政治體系的過程，並因此在某個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認知以及他們對政治現象的反應(Rush 1992: 92)。

此基本定義引發三個問題：

1. 政治社會化的目的為何？
2. 關於個人逐漸認識政治的過程，它具有怎樣的特性？
3. 關於社會化以及政治觀的建構、政治行為的類型之間所隱含的關係，又具有怎樣的特性？

這三個問題乃是本章的梗概，就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接下來這兩章的核心。

思考點

那你自己呢？

- 反思你自己的政治社會化經驗會是個很好的起點。
- 停下來想一想你自己的政治觀、你參與政治的積極程度以及你對自己所身處的國家之政治過程有多瞭解。我們稱這些東西為你的「政治概況檔案」。
- 現在想一想你是如何獲得這個政治概況檔案的。為什麼你對政治會有某些特別的想法？你認為什麼會使你決定採取政治行動？（「採取政治行動」不一定意味著你是個徹頭徹尾的行動派，你也有可能是個冷眼旁觀的人）
- 你為何會對政治過程如此瞭解（或如此不瞭解），你又是怎麼辦到的？

參、政治社會化之目的為何？

這個問題正好切中政治科學的核心。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重述為：為什麼人們必然具有政治性？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在《政治學》(*The Politics*)一書中聲稱：「人類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Aristotle 1985: 3)。亞里斯多德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類天生有著群聚的傾向，因此必須從屬於某個政治社群的一部份，才有辦法完整地發展成一個人。因此，既然人類就最基本的意義上來說是政治性的，那麼人類就必須獲得政治技能以便參與人類社群中最為複雜的部份，也就是國家。從亞里斯多德的真知灼見裡我們可以得知首要的論點在於：我們之所以需要政治社會化是因為這是作為一個人的根本要素。亞里斯多德的這種思想同樣出現在那些最有影響力的當代民主思想流派中，這些理論認為一個民主政體若要運作良好，就必須要有一群具備一定政治知識的公民。因此，唯有積極地追求與投入於政治知識當中，個人的自我發展才能克竟其功。



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通常被認為是第一個政治學家。即使是用古希臘時期的哲學標準來看,亞里斯多德都是個學識極為淵博的人。他所留下來的二十二本著作中其主題涵蓋範圍相當多元,包括了物理學、天文學、文學批評、倫理學與生物學等。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對後世的西方思想(與伊斯蘭思想)影響深遠。「政治學」一書就是典型的例子,此書反映出亞里斯多德的分類觀,他對理性力量所抱持的信念,他對實證主義的偏好,以及他不願規範何謂普世真理的這種立場。沒有哪種憲政體制可以理想化到普世皆準。相反地,應當修改憲政體制使之適於該社會。「政治學」一書對政治穩定的條件有深刻的反思,並探討了比較性的憲政分析。

這種推理方式通常是以公民為出發點。但我們也可以用另一種推理方式,將這種論證顛倒過來,主張任何政權如果要長久存續的話,那麼就需要將大眾的政治社會化引導至有利於該政權的規範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大可認為社會化是一種更為陰險狡詐的過程,將個人塑造成特定的角色,其主要的功能只是在為了該體系而服務。當然,這個過程邪惡與否或是否具有壓迫性,這大部分是要看該政權的本質為何。換言之,如果我們選擇把政治社會化理解成是在服務該政權的功能性需求,那麼我們如何認知該政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讓我們以工業化與後工業化的西方世界所大多採取的政權形式作為例子。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式的自由民主制。下面摘要則列出這類體制中針對政權本質的兩種解釋。又分別推導出不同解釋下其政治社會化的目的為何。

這乃是兩種極端不同的立場,我們故意以這種方式突顯出相當複雜的論證,但關鍵的分析要點在於,我們觀察事物的角度決定了一切。如果我們從第一種解釋來定義政治社會化,那麼我們很容易就會接受「個人至上」的觀點,並認為政權需要社會化過程方能正常運作。另一方面,若我們採取第二種解釋的話,就可能有強烈的理據認為政治

第一種解釋

■體制：

自由民主制乃是一種極大化該社會中之個人自由的體制。國家回應社會中各種團體對它所作出的要求，而公共政策大體上來說就是那些要求的綜合體。在民主治理的體制當中，最終的權威掌握在個人手上。除此之外，國家不會過度干涉公民社會，因此使得個人可以在法治的規範之下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政治社會化：

指人們獲得價值、規範與習慣的機制，而這些價值、規範與習慣可以使他們在多元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當中極大化他們的個人自由。社會化的內容為：(1)學習如何當個個人；(2)獲得政治知識與習慣，而這些政治知識與習慣可以透過參與自由民主政體的方式而使個體性獲得最佳的發展。

第二種解釋

■體制：

自由民主制乃是一種支援剝削性的資本主義式生產關係的那種政治體系。使權力與財富集中在擁有特權的統治階級或菁英手上，導致大多數的人們在經濟上被剝削。自由主義式的自由概念只是為這些更深層的系統性不平等提供一種意識型態上的掩護。

■政治社會化：

指一種控制機制，主要是在灌輸大多數的人們那些支持統治集團之利益(或至少不會對其造成威脅)的信仰體系與可接受的行為模式。這包括了將不平等給正當化，並在整個社會中散佈一種觀點，也就是當今的政權乃是自然的或是無可替代的。社會化使被壓迫的群體不去關注其真實的利益，教導人們說他們乃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個人，並掩飾整個體制中的不平等。

社會化通常有違人民的「真實」利益。此處的社會化乃是在強化既有的權利而非賦予個人權力。但不管是哪一種解釋，看起來社會化都有其必要，因為它是一種社會膠著劑，負責將公民與政治體制給黏在一起。不管是哪一種政權，如果沒有政治支持的話都無法長久。而政治支持有賴於人民承認他們的政治建制具備有效性。就像有位作者說的：「除非人民相信，否則的話總統得不到尊敬、法律不會有人遵守、也不會有人繳稅、政治也就不會穩定」(Jaros 1973: 7)。



波布

波布(Pol Pot, 1925-98)於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間統治柬埔寨，為犯下種族屠殺罪行的赤棉政權之首領，聲名狼籍。波布主張一種特別反動與仇外式的毛澤東主義，反對現代式的都市生活，尊崇農民式的共產主義之品德。為了達成他的目標，其手段慘無人道，估計約有兩百萬名柬埔寨人在被迫離開城市之時死亡，此外對異議份子也進行殘忍爆裂的鎮壓。對波布來說，教化是其計畫的核心。赤棉政權計畫以四年的時間完成他們的烏托邦理想，而計畫開始推行的第一年則封為「元年」。全面禁絕宗教。公民們被強迫要穿上一樣的服飾。知識份子、專業人士與政府官員們紛紛被虐待與殺害。被該政權所囚禁的犯人們(通常都註定早上暴死的命運)，往往被迫接受粗淺的洗腦手續。在越南入侵之後，赤棉政府於一九七九年垮臺。波布從未因其罪行而受審，並於匿名流亡期間死於泰國，他直至今日仍然是赤棉黨羽等強硬派的象徵性代表。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思考了社會化和政權之長治久安之間的關係。然而，我們也需要注意政治社會化在政治體系轉型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繼之而起的政治菁英遭逢困境，他們很難「教育」人民關於新政權的種種。這當然是因為在學習新政治體系的社會化過程中，也同樣需要學習「拋棄」舊有的政治價值、傳統與習慣。有時這種再教育的過程乃是透過殘暴的教化手段來進行，像是一九七〇年代時柬埔寨由波布(Pol Pot)所領導的赤棉政權。

我們往往會發現，新的習慣、實踐作為以及價值等會在政治生活遭逢重大斷裂時於焉而生，比方說遇到戰爭或革命的時候。以下摘要是個特別具有新聞價值的範例：在後塔里班時代(post-Taliban Afghanistan, 譯者按：或譯為「後神學士政權時代」)的阿富汗境內，新興憲政秩序的發展。請特別注意關於女性權利議題的新興辯論：

歷史的文件

民主之路上稀少的女性身影

Suzanne Goldenberg in Heart

衛報, 二 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阿富汗建立一個具有廣泛民意基礎且有代表性的政府, 這個看來相當棘手的計畫於昨日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昨日一個委員會被任命負責選出該國的決策者。委員會的二十一人名單由臨時政府的首長卡薩伊(Hamid Karzai)所公佈, 此委員會負責召集「大會議」(loya jirga), 也就是部落長老的集合大會, 這些人會針對過渡時期政府作出決議, 而此政府將從明年六月起開始統治阿富汗, 為期一年半。

他們的選擇將會被反覆深入檢閱, 因為此委員會試圖在相互競爭的族群利益、派系利益與區域利益中尋求平衡, 此外還有另一個對阿富汗人來說相當陌生的必要義務: 女性的代表權。但事實上在委員會裡只有兩名代表是女性, 這種數字當然會使得許多社會運動者和西方的觀察家們感到沮喪氣餒, 但這已經比有些傳統的阿富汗領導人們所能忍受的極限還要多了。好幾個星期以來, 聯合國官員們反覆深究這份名單, 企圖平衡敵對的派系勢力, 並試著確保該委員會至少在表面上具有其獨立性。

一個禮拜以前, 他們完成了把這份將近有四百名候選人的名單減到只有二十一人壯舉, 不過聯合國官員表示, 此名單是刻意安排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於昨日拜訪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時才公佈。安南表示: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完全滿意這份名單。但這的確是份不錯的名單, 讓我們支持這份名單並開始幹活吧。」

委員會的工作相當重要, 因為它必須確保一般的阿富汗人以及軍閥和部落領袖們都認為「大議會」具有其正當性。此份名單的公佈預料將會激化各種阿富汗團體之間的敵對狀態, 這些團體已然克制了好一段時間不直接挑戰卡薩伊的權威, 因為他們認為卡薩伊的六個月統治期只是過渡階段而已。然而, 為期一年半的過渡時期政府則意味著更誘人的權力與資源, 是故不同的阿富汗派系開始為了在大議會中擁有一席之地而各顯身手。卡薩伊在宣佈這份二十一人名單時似乎對這種現象感受特別深刻; 至於他自己預料也將在新政府中謀求一職。他強調說這份名單乃是由聯合國所制訂, 並宣稱他只認識其中四名被任名的代表。

卡薩伊說: 「這表示這是個非常好的委員會, 一個真正公正不阿的委員會, 而我希望這個委員會在聯合國的協助下能夠運作成功, 給阿富汗一個優良、具有代表性且公平的大議會。」

委員會的主席是卡辛亞(Ismael Qasimyar), 他是一位阿富汗的法律與憲法專家。他的兩位副手中有一位是女性: 霍柯瑪(Mahboba Hoqoqmal), 她是一名教授政治學的講師。

他們的任務困難重重, 因為阿富汗的各方派系皆摩拳擦掌準備競逐權力。

有些軍閥搖身一變成了政治人物, 而在巴基斯坦, 前塔里班政權的領袖們則組了一個政黨, 企圖參與政治過程。

阿富汗的女權運動者們已經在喀布爾靜坐示威了好幾個禮拜, 強力要求新任政府必須以憲法保障男女平權。

聯合國官員們承認, 在卡薩伊政府的組成份子中, 來自潘傑希爾峽穀(Panjshir valley)一帶的塔吉克族人(Tajiks)佔了壓倒性的多數, 他們所追隨的領袖乃是一個被暗殺的軍閥叫馬蘇德(Ahmed Shah Massoud); 此族群控制了外交部、國防部與內政部。

與卡薩伊政府很不一樣的是, 此過渡時期政府必須給普什圖族人(Pashtuns)更大的權力, 目前普什圖族為阿富汗境內最大的族群團體。

顯然在阿富汗建立新政府的計畫是以這種觀點作為基礎: 各種不同的意見都應當有發聲的機會與權利。但當臨時政府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五日因波昂協定(the Bonn Agreement)而成立之後, 明擺在眼前的事實是: 舊有的政治模式不會這麼簡單地就走入歷史。舉例來說, 據報導, 儘管外界預期新的阿富汗法律體制可以融入國際人權標準, 然而保守勢力依舊盤算著要保留截肢和用石頭砸死人犯等處罰方式來對付特定的罪行(ABC News Online, Australia, 30 December 2001, <<http://abc.net.au/news/newsitems/s449313.htm>>)。

我們或許並非天生就有一套現成的政治取向, 然而任何社會化模式的轉變都很有可能必須背負舊有模式的往日遺跡。

這種兩難困境對中歐和東歐的後共產政權來說特別普遍。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政治組織模式, 在這種模式裡, 由單一的政黨(也就是共產黨)統治全國, 不允許任何反對勢力存在。大多數的政治活動與幾乎所有重要的職業規劃都由黨的階層體制來進行操控。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通常都由國家統一領導。此外, 我們得記住的一點是, 共產主義這種政治模型乃是一九四五年之後, 或多或少是以強迫的方式被加諸在中歐與東歐

國家上的。正如許多左派的學者所急於指出的，支配歐陸東半部長達四十年的一種共產主義，乃是一種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整體來說和社會主義的原始形貌以及那些國家所擁護的社會民主制大相逕庭。

一九八九年以及其後所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導致共產政權以驚人的速度於一夕之間通通瓦解。在繼之而來的一片狂喜當中，開始有人大量提及轉型之事，包括轉型至自由民主政體以及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甚至有個學者，也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分析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92)，稱此轉變為「歷史的終結」，因為他認為這代表了西方的自由民主與市場價值不可避免地會散播至全世界。但如果要發生轉型的話，人們就必須「拋棄」共產主義，並用可能於後共產情境下乃是必須品的那些價值、規範、資訊和技能來加以替代。對前共產國家的決策者來說，他們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他們也不缺少外在的機構願意提供諮商和援助以促進這個所謂的轉型過程。例子有很多，就拿其中一個來說好了：歐洲委員會的援助方案“PHARE”(援波蘭與匈牙利之重建經濟方案[Poland and Hungary Assistance for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y]，後來又擴大範圍將其他幾個位於此區域的國家含括在內)始於一九八九年，在設計之初就有個明確的目標，即授以知識和技能。正如該委員會的文獻中所表明，此方案乃是為了引發「態度、價值與行為上的根本性變遷，以及獲得特殊職業和管理技能的方法」(出處：Axford and Booth 1995: 120)。另一個例子是波蘭的公民教育中心，它本身屬於一個國際組織網絡的一部份，該網絡所關注的焦點為「公民教育」。

那麼不管是管理者、工人、公僕或任何一種人，都可以用西方的方式被教育嗎？有辦法教導他們如何以市場式資本主義的路線重建他們的經濟體，以及如何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甚至教導他們如何獲得那些作為體制基礎的價值體系嗎？這中間當然有許多可辯論之處，包括由

公民教育中心

波蘭的民主體制如同其他地方一樣，如果沒有負責且積極的公民，沒有認識自己的權利與自由的公民，沒有信任民主體制並參與社群生活的公民，那麼其民主體制必然失敗。不幸的是，創造公民社會的過程會遭逢許多障礙。舉例來說：對不成熟的民主體制下那些不完美的制度和程式感到失望、幻滅，懷念前政權統治下的國家控制與社會福利，貧窮化以及某些特殊團體被整個排除在外的問題，包括許多年輕一輩的人。我們相信，積極的公民構成了民主的基礎，而教育在此過程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旨在幫助學校以及地方政府促進波蘭年輕人的公民態度與民主價值。我們將焦點置於教導人們在一個民主國家與公民社會中所必備的實踐技能。我們提供和學校與地方社群之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那些實踐知識。

(<http://www.ceo.org.pl/english.htm>)

西方的組織為後共產國家提供現代化模型究竟適不適宜的問題。不過我們的任務依舊是專注於知識教育與價值教育的概念。

來自不同學門的學者所進行的某些研究的確似乎指出，從西歐向東歐提供現代化之援助、協商以及訓練方案的這種作法，就根本上來說是過於天真了。最明顯的一點是，共產統治時期的遺跡處處可見。經歷共產統治的經驗使廣大的民眾產生某些特定的行為模式與期待，有學者認為，這些行為模式與期待以相當複雜的方式同樣影響了轉型過程。波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就對以下假設提出警告：共產主義解體的原因很簡單，只是因為群眾對體制本身感到幻滅，並普遍渴望以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來取代共產體制。包曼指出：

在團結工聯(一個獨立的工會運動)的全盛時期以及它在法律上遭受壓迫的時代裡，波蘭人民的不滿情

緒高漲，然而各式各樣的研究都顯示，有非常多的人(這個數量甚至不斷增長!)希望國家能夠滿足更多它對人民的許諾，特別是共產主義式的許諾(Bauman 1994: 20)。

換句話說，意見調查顯示，波蘭人並沒有全然捨棄他們對中央集權式之國家統治政權的偏好，直接了當地轉而支持建立在個人責任概念之基礎上的另一種西方式模型。因此，如果我們承認，共產政權的瓦解不盡然是因為人民渴望以某個「更好的東西」來取代它，那麼我們就可以推斷出，共產主義式的態度模式不會被一九八九年的「革命」以及其後的種種事件所自動清除得一乾二淨。其他的意見調查顯示，波蘭人對經濟重建這回事往往表現出明顯不一致的信念態度。舉例來說，一方面來看，波蘭人對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支持度不斷下降，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私有化的發展腳步太慢(Kolarska-Bobinska, 1994)。重點在於，我們所謂的那些繼之而起的概念體系(比方說私有企業、私有財產、個人主義以及民主等等)，並不會被人們直接吸收。它們與過去所學習到的價值體系之間的互動，會使這些新概念體系發生轉變，並產生不同的意義。確實就像霍夫曼(Eva Hoffman)所指出的，理解共產主義所留下來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不過還不僅於此：

今日的東歐被它多樣的歷史經驗所困擾，也被它的記憶、它的失憶、它的故意遺忘與丟棄，所糾纏。共產時期所留下來的影響當然相當複雜，但是更早之前的歷史時期其實也以鮮明的方式活生生地存在著，這些歷史時期的幽靈原本理應已經被共產主義趕盡殺絕了才對(Hoffman 1994: xv)。

我們甚至會推測,被社會化進一套新的行為模式與不同的價值體系,這對波蘭這種國家的人民來說,一點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一再被迫接受來自外界的外部模型,這種歷史經驗很可能會使人民對再社會化過程本身,產生一種冷嘲熱諷的犬儒主義情感。

以上對後共產時期之東歐的簡短討論理應使讀者心生警惕,不會匆忙地作出不成熟的政治學結論。對於此脈絡之下,社會化以及價值教育的重要性等等,過於泛泛的概括式通則無法對情勢的複雜性與微妙之處有公允的評論。很明顯的一點是意圖與結果之間的不一致。確實有人會試圖在這類國家中對民眾與重要的團體進行再社會化,旨在建立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政體,然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先前的社會化模式似乎也會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發揮其影響。

肆、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直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證明瞭社會化可能是政權穩定的要件之一,而且難以預料社會化的後果為何。現在我們的任務乃是開始回答在本章緒論中所提及的那些「何時」和「如何」的問題。

一、何時?

在政治社會化的相關文獻當中,「何時」向來是個被激烈辯論的問題。卡瓦納(Dennis Kavanagh)將辯論的兩方分別定名為「原初學派」(primacy school)和「後天學派」(recency school)。這些名稱暗示各個學派強調的是政治社會化中不同的關鍵時期。支援原初學派的人強調童年的

重要性(特別是早期的童年),而後天學派的分析家們則指出人的一生當中所持續經歷的社會化與再社會化過程的重要性。不過,我們必須記住一點,這個辯論不僅僅是關於政治學習何時發生。有時人們會忘記,原初學派和後天學派乃是建立在非常不同的假設之上,因此整體上來說表現出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尤其是對人類學習過程的看法。

「原初理論」援引某個流派的心理學,該流派強調早年經驗對個體發展具有關鍵的重要性。「關鍵時期」(critical period)的概念此處即派上用場。最知名的「關鍵時期」範例源自對鴨子的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鳥類除非在孵化之後的幾小時之內就習得某些特定的資訊,否則的話就無法「正常」發展。如果換成人類的話那麼該論證就會變成:早期童年的某些關鍵時期(或「敏感」時期)乃是我們的大腦特別適於吸收某些特定資訊類型的時候。語言學習研究指出,人類若要在童年之後才學習基本的語言技能會極端困難。一般相信這是因為兒童不管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已經做好回應外來刺激的準備,使他們有辦法獲得和語言有關的那些知識和技能。因此,個體很有可能在早期童年的某個關鍵時期,被社會化因而習得某些重要的政治資訊類型,有可能是由他們直接接觸到的家人和監護人來提供這樣的社會化環境。嬰兒和小孩子們顯然不具備足夠的心智能力,無法對時下重大的政治議題發展出完整的個人意見;他們也無法瞭解像投票偏好這種複雜的概念。原初理論的論點在於,在早期童年階段所吸收到的那些價值,會在後來的人生當中發揮其重大影響力,也就是個體開始熟知政治這個公共世界之時。

相反地,政治社會化的「後天學派」其基本立場為,政治學習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與人一生當中各種不斷在改變的經驗有關。此理論立場援引的是心理學中

的自我認同建構研究，它認為自我定義與自我理解是會改變的。特別是，在發展出「成熟」自我的過程中，會牽涉到對早年影響的抗拒。就政治學習來說，這個論證似乎就變成：社會化的結果從來不會對一個人產生根深蒂固的影響，外在環境的改變可能會導致政治認同的危機，並使人經歷再社會化，是故習得新的習慣、規範與信念。

思考點

想一想你自己的政治經驗如何。

- 上述兩種架構，原生學派與後天學派，哪一種看起來比較能夠解釋你自己的政治社會化經驗？

這兩種學派的立場都有經驗研究的支持。此領域的第一個經典研究乃是海曼(Herbert Hyman)的「政治社會化」一書(*Political Socialization*, 1959)。海曼的研究數據似乎支持以下的主張：美國兒童傾向於和父母持有相同的政治偏好。這可以被視為是政治價值的學習發生於童年時期的證據。伊斯頓(David Easton)和鄧尼斯(Jack Dennis)在他們的研究《兒童與政治系統》(*Children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1969)中，探討了童年時期的政治價值學習過程。他們作出這樣的結論：童年時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有四個階段，兒童在此過程中學得何謂權威。在第一個階段中，兒童會認知到某些人不知為何就是掌有權威。因此，爸媽可以規定上床睡覺的時間，或者員警可以逮捕歹徒。第二個階段，兒童會認知到權威可分成公領域的權威與私領域的權威。在這個階段中，兒童會開始明顯認知道：父母所行使的權威類型和員警所行使的權威類型就本質上來說是不同的。在第三個階段中，兒童會認知到權威可以根深蒂固地體現為某些體制，如政府、國會與法院。最後一個階段也是最複雜的一個階段，兒童會

開始瞭解到，體制和處於體制中的個人乃是相互分離的存在。

在伊斯頓和鄧尼斯的模型裡，第三和第四階段建構出一個人對一般大家所謂的政治世界的認知：也就是權威性體制的範疇。有趣之處在於，伊斯頓和鄧尼斯認為政治學習過程的開始早於我們對政治人物、政黨、國會等事物的正式理解。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不必然要具有理解自身和「政治性」客體之間的關係的那種能力，才算得上是已經被政治社會化了。除此之外，我們早年所學習到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率先進入我們腦海裡的東西就會一直留在那裡，提供我們看東西的框架與分類範疇，以認知與分類後來所習得的觀念。此外，早期學習發生在我們具有可塑性和開放性的時期：於童年時期所學習到的那些假設，似乎通常是以一種未加質疑的方式所吸收。這種假設可能會變成不加思索的重大預設，對思想和外顯行為構成一種背景的效果，而這正是因為在獲得這些假設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自覺因此無法開放接受挑戰(Greenstein et al. 1970, cited in Kavanagh 1983: 45)。

支持後天學派的論據最常出現在那些研究個人如何適應新環境(政治環境)的理論當中。舉例來說，在英國，被選為國會議員的政治人物常常都會提到，下議院的氣氛就像俱樂部一樣，對新加入的成員會施以特定的、獨特的規定和實踐方式。在這類環境之下，除非徹底地學習這些怪裡怪氣的程式，否則很難施展什麼有效的政治行為。以下的摘要就記述某些這類的習俗和慣例：

議員高談闊論之處；辯論的形式與風格

傳統上來說，內閣部長們坐在議長右手邊的第一排：黨鞭通常坐在這一排靠大走道的位置。資深議員和前任首相通常會坐在大走道上方的第一排。國會私人秘書通常坐在各個部長的後方那排。最大反對黨的發言人坐在議長左方的第一排。反對黨坐在左方、大走道下方的位置(通常是前兩排)，不過和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的少數黨可能會坐在右方的位置。這些位置的安排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之處，而且在各式各樣的情況下，若有個國會議員故意選擇要坐在第一排或是與慣例相反的位置上，也不會有去修正這樣的行為。後面這種情況確實可能會發生，比方說當組閣的最大黨所佔的席次很多時，那麼就沒有什麼剩下的位置可以給支援該黨的議員坐了。「換邊坐」(crossing the floor)指的是永久性的換黨，這確實是有可能的，不過這自然很少見。如果有個國會議員離開某個反對黨，然後加入另一個反對黨，該議員「實際上」可能不需要真的「換邊坐」，但是會在下一次開會時，和他所屬的新政黨之議員一起坐。有些國會議員在兩大黨分別執政時期都曾兼任內閣部長(比方說霍倫[John Horam]、普蘭提斯[Reg Prentice]以及哈沃斯[Alan Howarth])。

議員們只能在他們被傳喚之處發言，而他們被傳喚之處必定是在「議院之內」：也就是在主席位之前，但不超過底端橫槓(指橫跨院內寬度的白線)。他們不可以在院內位於紅線之間的地板上發言(傳統上紅線之間的距離應當是兩把劍的長度)。他們可以在側廊上發言，但是由於那裡沒有麥克風的關係，所以很少有人會這麼做。此外，如果樓下還有位置的話，議長是不會叫站在側廊的議員發言的。議員們必須站立發言，不過如果議員是殘障人士或因故不能站立，當然就會被允許坐著發言。

國會內的辯論風格傳統上來說都是針鋒相對式的；聆聽其他議員的發言然後可以自動自發地插話以回應對手的觀點。是故這種辯論風格和某些其他國家的國會非常不同，通常在其他國家中，大多都是在講臺上或是個人的座位上朗讀事先準備好的演講稿。針鋒相對式的辯論風格會使得下議院成為一個生氣蓬勃但也非常吵的地方，充滿了直言不諱的意見、插話一大堆、表達贊成或反對，有時則是機智與嘲弄。

當然，有活力的辯論和直接了當地表達意見，以及蓄意威嚇對手之間，其界線難以劃分。當議員們在發言的時候，他們有權

利被好好地聆聽，而不受擾人的背景噪音所干擾(不管是不是刻意發出的噪音)，如果有人似乎企圖以噪音淹沒某議員的發言，或者當有議員要離開會場，或大聲交談的話，那麼主席會要求維持會場秩序。議長也有權知會某個不尊重辯論禮儀的議員說，他可以不用期待自己享有優先發言權了。但是諸位繼任的議長們都會謹慎行事，不要對國會裡那種有活力又直率的言論表達方式加以過度約束，因為下議院的風格從來就不是靠著過度的禮貌拘謹與自我克制而獲得其活力的。在某些國家的國會裡，對部長以及首相表現出高度的崇敬與服從，這在英國的下議院中通常很難看到。

為了維持辯論的自發性，國會中不允許朗讀事先準備好的講稿。不過，不是每個國會議員都是傑出的即興演說家，所以豐富的事後註釋是可以被允許的。不過在提出附議時不准加註釋，雖然說最近全面禁止直接引述的條款已經被取消了。但是部長們對可能的附議可以加上註釋，通常由他們的公家助理來擬定。

(摘錄自「下議院的傳統與慣例」[*Som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http://www.parliament.uk/commons/lib/fs52.pdf>>

請記住，這些程式中有一些已經經歷了近來的現代化過程。在一個世紀以前這些程式甚至更為複雜。同樣的資料來源引述了國會議員金尼爾(Alfred Kinnear)的話，他試圖解釋一九〇〇年時某個國會協議的特定面向：

不管何時，進入議院時都必須脫帽，然後就坐之後再戴上帽子；如果要起身發言或者不管因什麼目的離座時，必須再度脫帽。如果國會議員要發言質詢的時候他必須起立，然後脫帽；他可以坐著聆聽部長的回答，然後戴上帽子。當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而議員選擇挑戰主席之命令時，他必須坐著然後戴上帽子。如果他要對議長提出議事規則方面的問題，而不是關於辯論立場的問題，那麼他必須起立發言然後脫帽。當他離開議院去加入某個意見立場的討論時，他必須脫帽，但投票表決時要戴上帽子。如果女皇陛下送來訊息由主席代為朗讀的話，議員們必須脫帽致敬。總而言之，如何就坐，如何禱告，以及何時戴帽脫帽等，都是國會議員們必須嫻熟無比的議事學問。

(<<http://www.parliament.uk/commons/lib/fs52.pdf>>)

學習「遊戲規則」顯然一直都是如何成為一個優良的國會議員的重要面向。但是熟悉這些規範不僅僅是要學習接受這一連串奇形怪狀的程式規則或習俗慣例而已。如果國會議員們想在國會中發揮影響力或追求個人職業生涯之精進的話, 他們必須真正瞭解下議院的實際運作狀況, 也就是國會的文化。以下的回憶錄片段出於前保守黨議員佛曼(Nigel Forman)所撰寫的一本關於英國政治的書籍:

下議院之國會文化還有另一個有趣的面向, 也就是黨鞭透過所謂的「一般管道」(the usual channels)來組織制度化的政黨衝突。這個詞彙是種委婉的說法, 指每天都會發生的那種有時相當激烈與強勢的討論, 通常隱身於幕後且不會被記錄下來, 這些不會被記錄下來的討論發生在國會議長、組閣之政黨的黨鞭、反對黨領袖、最大反對黨的黨鞭等人之間。若沒有這些討論所帶來的益處, 整個議會大概會停滯不前; 這些討論通常牽涉到部長、黨鞭與反對黨的議員們。因此, 兩方之間的根本協議乃是基於兩個假設: 第一, 政府必須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第二, 反對黨必須享有反對的完全自由。

合作的原則確實顯現在個別國會議員的態度與行為上, 這些議員們一旦進入國會殿堂之後, 為了要確立「同夥」(a pair), 每個人都奮戰不懈; 所謂的「同夥」指的是某位站在另一邊的成員, 同意就特殊的場合與原因, 在要投票時遠離要選邊站的大廳, 因此投票的整體結果就不會被影響 國會文化最後一個值得一提的面向為, 所有政黨的國會議員都很喜歡可用餐的俱樂部與各種非正式的政治性聚會, 尤其是保守黨的人更是如此 在工黨裡, 各式各樣不同的派系通常喜歡在茶室裡聚會、聊天, 有時則是在此密謀。保守黨比較喜歡國會議員的用餐室或是露臺上的私人房間, 或者甚至是在他們位於倫敦的私人宅邸內。

這類團體的意見被清楚闡明之後, 會被提交給相關的國會議員, 而議員們不會花太多時間把他們的討論要點傳達給黨鞭, 或者有時以適當的迂迴方式, 將其用來遊說記者。正是這些方式與「宴會」(symposia, 就這個字詞在希臘文中的意思來說)型塑與發展了西敏廳中大部分的政治意見[譯者按: 西敏廳(Westminster)即為英國的國會]。

(Forman 1991: 154-5)

從佛曼的解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個人的政治價值會受到大量的媒介影響，特別是在個人進入一個新環境的情況之下。這種媒介有好幾個面向。深藏在體制當中的規範，如英國下議院所提供的「遊戲規則」。這意味著對個人政治價值的追求必須能夠與這些規範相符；一個國會議員如果想要國會裡「出人頭地」，就必須乖乖地遵守這個具有長久歷史的政治遊戲裡的各種規矩。不過，學習這些新規則的過程可能也牽涉到新價值的學習，這些價值可能出於國會本身或是那些國會內的大黨。政治科學之制度研究途徑中的某些理論類型提醒研究者們不要輕信以下假設：行為者們會帶著既存的價值體系與利益進入制度環境當中。參與體制被視為是催生價值與理解的途徑。這種觀點和政治社會化的後天學派非常相似。

二、如何？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得知，政治學習不只是在有意識與刻意的情況下被引領進入體制、政黨與議題的世界當中。如果經驗研究所揭露的某些證據為真，那麼我們可以不失公允地說，父母親給小孩子們所設下的限制對政治學習來說可能是重要的(或許可能更重要)，甚至比讀教科書或上關於政府功能的正式學校課程還來得影響深遠。總而言之，我們不會總是意識到政治社會化正在發生。

這當然不意味著政治社會化從來都不是刻意發生的。人類的近代史充斥著各種威權政體，它們企圖教導其人民適當的價值與規範，而且是從童年開始就這麼做了。共產主義的政治體系再度給了我們一些有用的範例。在這類政權裡，學校以及高等教育裡的教學大綱由中央來控制，並被視為是個重要的成分，目的在於創造

出有能力肩負創建共產主義之任務的公民。在前蘇聯，公權威訂立嚴謹的指導方針，指導年輕人的道德教育。一份一九六四年的報告形容了蘇聯的學童們如何被教導以下事物：

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會走到盡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會獲得勝利，另外就在國內建立共產主義此一要務而言，蘇聯共產黨扮演帶頭領導與組織一切的角色。歷史與社會研究都是重要的手段，可教育學生使之具有對社會主義母國的無私之愛，並全心奉獻，而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因無產者的國際主義之故而享有和平與友誼(引述自 Lane 1978: 497)。

前蘇聯當局顯然認為發展年輕人的某種道德規範，以及政權的長期穩定之間，是有關連的。另一方面，有趣的是，兒童們的作業習題以及學校的作業本裡也到處點綴著意識型態的訊息。拉許(Michael Rush)引述了蘇聯教育裡的某個數學問題作為例子：

第一位太空人是蘇聯公民，也就是蓋加林同志(Yuri Gagarin)。他在一百零八分鐘內環繞地球一圈。那麼這趟首度環繞地球的飛行總共耗時多少小時又多少分鐘？

一旅的石油工人一年必須鑽六公里又六百五十公尺深的地。在頭半年，他們鑽了四公里又九百公尺，下半年則鑽了不到一公里五十公尺。這個旅有沒有達成他的年度計畫呢？如果他超前了計畫，又超前了多少？(Rush 1992: 94)

東德於一九五八年引進一種「綜合技術」性的中等教育體制。訓練該體制中的學生成為社會中腳踏實地的體力

勞動者，為共產主義的目標而賣力。根據官方說法，課程規劃會採取以下的形式：

一年級到六年級生要上手工藝課，而在此課程中，學童們會學習如何應付簡單的工具，處理各式各樣不同的材料，並生產有用的東西。從七年級開始，學童們一個禮拜去一次工廠，這就是所謂的綜合技術性指導。其理論性的部份由兩個主題課程所組成：「社會主義式生產入門」以及「技術性繪圖」，而實際參與工廠裡的生產過程則被稱為「生產工作課」。他們學習如何穩定與刻苦地勞動，遵守秩序、守紀律，並體會勞動的整體價值。學童們的表現如何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發展出技能與人格特質(引述自 Childs 1983: 174-5)。

思考點

- 你對這類國家在共產統治時期透過教育來進行政治社會化的作為有何看法？
- 共產政權是否在本質上有什麼特質驅使它們必須要實行如此公然刻意的政治社會化教育？
- 你在你自己的國家的教育體制當中有觀察到任何類似的過程嗎？

若從西方國家的角度來說，一般人直接的反應會認為這種社會化乃是威權政府既粗糙又令人厭惡的特質，一點都不民主。雖然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美國以及大多數的西歐國家也同樣發展出一套學校內的「公民」教育課程。這種課程在不同國家內會有不同的變化，但一般來說它是中等教育中的強制性課程，教導學生基本的憲政原則以及政治過程和法律過程如何運作等等。

此外，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西方國家中學校課程的作用和前共產國家是一樣的：都是要誘導年輕人擁抱對現政權

有利的價值。其中關鍵性的差別在於：在西方國家中，學校課程的控制通常須符合民主控制的形式及大眾的需求。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大略探討了家庭與學校發揮的所謂社會化效應。在社會化的研究文獻當中，它們被稱之為社會化的機構。不過，家庭與教育當然不是唯一的社會化機構。我們也可以探討工作場所、社會階級、同儕團體、休閒活動或者宗教團體的成員身份等，對社會化所帶來的影響。其中一個值得我們在此處深入探討的機構則是大眾傳媒。大眾傳媒又可分為平面媒體(像是報紙)以及電子媒體(比方說影片、廣播、電視以及資訊科技)。為了方便討論的進行，我們在這裡只簡要地討論電子媒體所扮演的社會化角色，尤其是影片。

我們在給小孩子看的影片中有沒有發現這些影片在灌輸某些價值，或者至少隱含了某些價值？一個很明顯的案例就是迪士尼公司所拍攝的影片。迪士尼因製作精緻的長篇動畫而出名，這些動畫通常具有明顯經過設計的劇情。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些影片中究竟傳達了怎樣的價值，這會是個很有趣的觀察點。有褒有貶的動畫「幻想曲」(*Fantasia*, James Algar *et al.* 1940)以一連串的動畫，詮釋許多古典樂的篇章。在這些片段當中，有一段動畫充滿了飛馬、山林女神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神話人物，然後搭配上貝多芬的音樂。對某些人來說，影片當中的這一段呈現出相當僵化的性別刻板印象(因此也強化了刻板印象本身)，而且這或許正是那個時代的普遍風氣。「小鹿斑比」(*Bambi*, David Hand, 1942)述說一隻小公鹿的故事，牠在一個林木鬱鬱森林中被媽媽養大，並且由牠(經常不在家的)爸爸教導牠何謂責任與生命中殘酷的一面，以及如何成為一個男人。最近另一部動畫「風中奇緣」(*Pocahontas*, Mike Gabriel and Eric Goldberg, 1995)則是講述一個愛情故事，女主角為美國原住民某部落的公主，男主角則是一個殖民地的英國船長，影片中同時呈現了原住民文化的和諧價值，以及理

應很「文明」的文化所具有的野蠻傾向。但是片中寶嘉公主(Pocahontas)與史密斯船長(John Smith)之間短暫的戀情，是在證明跨文化間相互協調理解的可能。

如果我們接受「核心價值在人生初期即已印下烙印」的觀點，那麼這種媒體就變得很重要了。而後天學派的解釋則指出電影以及其他媒體對型塑成人政治敏感度的影響。畢竟有些影片確實傳達了相當明顯的政治訊息。就拿 薩爾瓦多 (*Salvador*, 1986) 為例，導演奧立佛史東(Oliver Stone)在片中嚴厲批判美國對中美洲的外交政策；或者如 天生贏家 (*Bob Roberts*, 1992) 一片，導演提姆羅賓斯(Tim Robbins)在片中對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基本教義派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有些電影可能看起來不那麼明顯具有「政治性」，但可能企圖傳達某些特定類型的價值。這類例子包括了 十二怒漢 (*12 Angry Men*, Sidney Lumet, 1957)，本片令人讚嘆且極具戲劇張力，片中亨利方達(Henry Fonda)所飾演的自由主義派陪審員，企圖翻轉其他十一名陪審員的偏見，因為他們急著想判定一名年輕的殺人嫌疑犯有罪；或者像是女性主義的公路電影 末路狂花 (*Thelma and Louise*, Ridley Scott, 1991)。

不過行文至此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到底媒體所提供的刺激在多大的程度上扭轉了我們的看法，還是在加強既存的認知？很不幸地，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明確的答案，雖然已經有了許多相關研究。克萊斯坦伯(Hans Kleinsteuber)是這麼說的：

如果問人們媒體究竟有沒有影響力，我們會得到模稜兩可的答案：人們會同意媒體對一般大眾來說有影響，但卻否認媒體對自己有影響。對徹底轉換政治信念來說，重要的是當事人先前的態度：如果該政黨不合選民的意，電視節目沒有符合他的期待，或者首要的候選人看起來不值得信任的話，那麼即便是技巧最上乘的廣告也無法改變選民的心意。

(kleinsteuber 1995: 129)。

當然，我們很難依據個人的認知來衡量媒體的影響，而這也是政治社會化研究中主要的問題之一。我們很容易看出行為者想傳達怎樣的價值，但是整體來說要看出在行為者所接收到的外來刺激中哪一種確實會產生效果，這卻得花上很大的力氣。正如上述克萊斯坦伯的評論所指出的，詢問某人他自己有沒有被影響，這似乎不太可能產生什麼特別值得信賴的回應。

伍、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

政治學習或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並不是一門自我隔絕又抽象的學問。這個我們應該已經很清楚了。為了替本章作結，我們要回答以下三個特別的問題，關於政治社會化分別對政治科學、政治以及政治系統具有什麼更廣泛深遠的含意。

一、政治社會化如何增進我們對政治學的理解？

為什麼政治科學家們對社會化會產生興趣？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任何一個認真研究政治的人都會思考過以下問題，政治學習與政治行動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或是哪種類型的政權可能會具有哪種特定的正式或非正式之社會化類型作為其基礎。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思考方式至少可上溯至古希臘時期。但是作為一種「概念」的政治社會化，乃是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的政治科學圈中所發展出來的。

正如大多數評論家所承認的，政治社會化成為一門嚴

肅的經驗研究學問，這與政治科學中的所謂行為主義革命脫不了關係。從**行為主義**的觀點來看，政治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的主要目標在於解釋個人行為與集體行為。桑德斯(David Sanders)表示：「行為主義者會問的核心問題是：『個人、體制性的行為者及民族國家為何會如此行為？』」(Sanders 1995: 74)。以這種方式塑造研究的問題意識，表示行為主義者對建立因果關係的模式有興趣。圖 2.1 顯示出行為主義推理方式的基本模式。這又會導引出一些附帶的問題，衍生出其他的行為主義取向之研究。這些研究可包括：

1. 為何刺激 x 會導致回應 y，而不是其他回應？
2. 行為 y 所產生的政治系統性結果 z 如何影響以後的政治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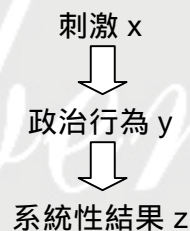


圖 2.1：政治科學之行為學派的基本推理

此外，行為主義者堅稱我們必須有能力觀察行為以及在經驗上檢驗假設。經驗性政治理論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將可供驗證或否證。換句話說，行為主義運動與力圖使社會現象研究更加科學化的探索之舉密不可分。我們已經在本章的緒論中探討過政治學研究究竟有沒有可能更為科學化的問題了，不過對此議題再多加思索還是有益的。對行為主義者來說，在追求特定假設的過程中，從可觀察的政治現象累積經驗資料，這可能會產生出政治世界之誘人的法則式通則。不過還不僅僅是研究結果在科學上具有效性

而已。行為主義者(就像其他主張實證主義的學者一樣)也相信,他們應該且有可能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設計與執行自己的研究計畫。

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如果我們有辦法針對人們是如何學習政治、何時學習政治以及從哪些來源學習政治等問題,導出經驗性通則的話,那麼我們就有一套具有強大潛力的工具,可以解釋人們在政治上如何行為。除此之外,由於行為主義者專心致志於可以立即被觀察到的現象,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也傾向於將焦點置於可測量的政治資訊來源上,比方說學校課程或大眾傳媒或研究孩童間長時間的學習模式。

思考點

- 你覺得行為主義研究途徑對政治學研究有何意義?
- 此途徑有何明顯的缺陷嗎?

對行為主義的支持者來說,行為主義與其他類型的政治研究相較之下,具備某些優點。或者就該研究途徑的立場來說最不為人爭議的主張就是它擴展了政治科學的範疇。行為主義的擁戴者們聲稱,行為主義將研究重心從傳統的政治制度與憲法之法律研究,轉移至在政治系統的所有層面上人們實際上的政治行為。爭議性更大的一點是,行為被當成是政治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分析單元;舉例來說,行為比制度法規或規範更為重要。以這種方式進行政治科學研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研究方法上的改進,所以可以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並經得起複雜的統計分析。電腦硬體與軟體設備上的發展使得這類技術對研究者來說不再構成那麼大的負擔,並且可以蒐集與處理大量的資料和數據。

但是對反對行為主義的人來說,行為主義是個很糟糕的政治學研究途徑,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種批判路線

認為行為主義可能會產生出過於經驗主義式的研究成果。這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的教條只會鼓勵人們拼命累積大量的事實而已。唯有在大量累積的經驗資料中開始產生某些規律性時，通則才會於焉而生。對許多社會科學家們來說，這個研究途徑根本就是頑固地在堅持錯誤的見解，因為它否定了設計理論性與概念性範疇，比累積和操控資料數據具有更大的重要性(Sartori, 1970)。因此我們所得到的政治科學乃是建立在容易測量的現象之上，而非那些具有理論重要性的現象。此一批判路線又表示，理論乃是唯一可以幫助我們對雜亂無章的社會世界進行分類的東西，如此一來我們才有辦法追問有意義的問題，並且選擇相關的資料。這些的確都是政治世界中無法被計算或是加以有意義地量化的元素，這也意味著行為主義者們在其理論解釋當中，有可能冒著疏漏某些重要元素的風險。

桑德斯在討論行為主義時(Sanders, 1995)表示，這種研究取向有可能會忽略某些具有潛在重要性的解釋，因為這些解釋可能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被組織化。他以投票行為研究為例；該研究試圖對個人的投票動機加以進行相當複雜的分析，其基礎在於許多不同因素之間的互動，比方說社會背景、意識型態認同與政黨認同、和經濟觀等。然而，舉例來說，投票研究中就沒有融入個人認知自己的方式。就桑德斯的說法：「我們很難想像對這類問題的回應該如何融入正式的分析當中，因為要系統性地測量那些回應相當困難。這所導致的結果是，這些回應大多都被排除在分析架構之外」(Sanders 1995: 66)。

第二種批判也與第一種批判相關，其觀點為：行為主義派的政治科學提升了量化的重要性，但卻貶抑了理論的重要性。受行為主義影響的政治學者具有測量事物的傾向。如果資料可以被測量的話，才算有效。但事物總有正反兩面，這也意味著如果資料無法被量化的話，那就不是有效的資料。這違反了一套相當不同的政治世界之假設，

以及如何研究該世界的看法。比方說,許多批評者指出,行為主義的偽科學傾向使得許多研究者們忽視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自己也是他們所企圖解釋的這個社會世界和政治世界的行為者之一。客觀性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以下這點特別重要:行為主義預設理論和觀察是可以被分開的。研究者被描繪成一個客觀的旁觀者,以所觀察到的現象為基礎進而建立經驗理論。但是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主張,所有的觀察都會被既存的理論立場所影響。因此研究者進行觀察的方式可能會受制於某些理論成見。的確,選擇要觀察什麼也同樣可能受到類似的限制。此外,這種科學主義也被指控為忽視政治研究的規範性要素。行為主義者們認為所謂的價值中立是件好事,但是把價值給邊緣化也可能同時忽視了政治哲學中某些重大的問題,比方說關於權利、自由、正義等等的問題。

批評者火力猛烈的論點導致學者們放棄了最為熱血積極、實證主義式的行為主義。雖然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行為主義仍然是當代政治科學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流派之一。選舉研究和投票研究的核心都對行為面大為重視,而選舉研究和投票研究或許算是政治學研究中最出名、最廣為人知的學派了。

就本書的脈絡來說,行為主義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提出了一種特別的政治科學研究方式,也是因為本章以及第三、第四章所牽涉到的內容。我們將會看到,不一定要成為一個行為主義者才有辦法研究政治行為。但如果我們對行為主義派之政治科學沒有基本瞭解的話,那麼我們很難徹底瞭解目前為止針對社會化、政治文化和政治參與等主題所做的研究。

二、政治社會化如何增進我們對政治的理解?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加以簡單回答即可。如同以上所

述, 針對政治社會化所做的研究顯示政治乃是一種基礎廣泛的活動, 不僅僅限於正式的政治制度之世界而已。政治社會化研究擴展了政治學研究, 開始分析政治行為(個人與團體如何在體制所設下的界限之內活動)與研究政治行動背後的影響因素。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政治社會化研究的基本假設之一為, 對政治事物的取向, 乃是動員其他價值之後的產物, 而這些價值我們可能是從其他場域中學習而得, 不管是一個在看迪士尼影片的小孩還是一個在工作場合中面臨難題的成人, 都是如此。因此, 政治不盡然是一個和所有其他生命面向相互隔絕分離的人類存在領域。從很多方面來說政治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三、政治社會化如何增進對政治系統的理解？

政治社會化的研究提出一些本質上很有趣的問題, 關於個人獲得其政治觀與對政治事物之取向的方式。然而, 提出一些更宏觀的議題也相當有用, 這些議題在接下來幾個章節中將會進一步地發展與討論。最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所學習到的政治事物, 與我們所生活其中的政治系統的穩定性(或其他面向)之間, 有著怎樣的關係。我們所學習的政治事物(比方說特定的知識內涵以及更深層的價值)是否在某種層面上是支持現政權的呢? 另一方面, 我們有沒有可能學習並動員非正規的價值或是反政權的價值? 此外, 當我們被社會化時, 我們所學到的究竟是什麼? 這正是第三章所要探討的核心議題。最後, 我們被社會化的方式是否會影響我們參與政治行動的方式(第四章的主旨)?

很遺憾地, 我們現在得先把這些問題擱在一旁。另外, 你也不應該期待這些問題會有任何簡單明瞭的答案, 即使你讀完了這整本書也是一樣。政治科學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 這是我們的不幸, 然而最終你應該還是有能力以更具有概念深度的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

陸、結論

我們皆會學習到關於政治的事物，但不見得是以非常明顯可見的方式。當一個六歲的小孩坐在教室裡，埋首於老師所指定的寫作習題時，我們有多常認為這個小孩正在被「政治社會化」？當我們坐下來觀賞電視上的影片時，我們會認為這部影片可能是在宣傳某些特定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可能強化我們原先所抱持的價值，或者與之相衝突嗎？當然，上述這些例子究竟應不應該被理解為獲得與習取政治價值和規範的例子，還有很大的爭論餘地。這端視我們認為政治是什麼，以及什麼是與政治有關的知識。研究社會化的一大長處正是在於它會引發這些嚴峻的難題。如果我們有幸的話，藉著研究政治社會化，將會使我們對所研究的主題不那麼驕矜自滿。

本章摘要

- 學習政治不僅是在學習關於政治體系如何運作的正式知識。相反地，學習政治也與核心價值和態度的發展以及對權威的認知有關，這些事物合起來會影響一個人的政治觀，並型塑政治行為。
- 政治科學家們用「政治社會化」一詞來描繪此種過程。
- 一個政權如果不將其人民社會化、使之接受一套相關的規範，便很難維持其正當性或保持穩定。
- 究竟政治社會化的關鍵過程是否發生在人一生中的早期階段，或者說不斷改變的人生經驗會引發重大的再社會化契機，相關的辯論可說源源不絕。這兩種不同的觀點我們可將之分別稱為「原初學派」與「後天學派」。
- 政治社會化透過社會化的機構來進行，像是家庭、學校、同儕團體與媒體。
- 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使我們轉而思考政治過程中某些比較非正式的面向。除此之外，政治社會化之所以會被研究，是因為某些政治科學家們相信將人們社會化使之接受核心社會價值的模式，可以解釋不同的政治體系如何運作。

重要讀物

Easton, D. and Dennis J. (1969) *Children and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關於成年之前的政治社會化最出名的研究。

Eulau, H. (1963) *The Behavioural Persuasion in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由行為主義首要的實踐者所做的有益討論。

Hyman, H.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ur*, New York: Free Press.本書還是值得一讀。通常被視為是第一本對政治社會化進行系統性研究的著作。

Kavanagh, D. (1983)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London: Unwin Hyman.對政治科學之行為學派的幾個重要主題進行清晰、具批判性的討論。

進階閱讀

Kundera, M. (1987) *Life is Elsewhe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一九七三年發行初版, 為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作的一本黑色喜劇式小說, 探討一位詩人的藝術養成過程, 以及他如何接受史達林主義的洗禮, 最終又加以放棄。[譯者按: 本書中譯本「生活在他方」由時報出版, 1992年]

Milgram, S.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and Row.當人們必須服從權威時, 究竟會願意服從到什麼地步? 米格蘭的實驗至今仍存有許多爭議, 而他所下的結論通常也頗讓人憂心困惑。

Mill, J. S. (1964)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一八七三年發行初版, 為九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之一的自傳。最讓人感興趣的地方是, 彌爾在書中細靡遺地詳述他父親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在他身上所進行的嚴格實驗性教育, 他父親本身則與功效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思想相近。

Young, H. (1990) *One of Us*, London: Pan.前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傳記, 這本書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注意到柴契爾早年的經驗對她的政治觀發揮了正式的影響。

【練習】

試以五百至一千字左右的文字, 簡短地敘述你自己的政治社會化經驗。將這些思考內容白紙黑字寫下來應該是個頗有助益的練習; 這可以幫助你體會個人經驗與政治學研究之間的關連。記住, 你不需寫下自己對特定政治議題的看法。相反地, 你應該想想, 你所抱持的那些看法是從哪裡來的, 而在你人生中有哪些因素影響或改變了你對政治世界的觀感。

以下的指引或許有所裨益:

1. 我的政治觀為何? 不只是我支持哪個政黨而已, 還有我對某些更廣泛的議題的看法; 就實際上來說, 我有任何可以清楚指明的政治觀嗎?
2. 我是否可以指出任何可能對我構成政治影響的社會化機構? 此處我們指的是父母、老師、朋友以及媒體。
3. 我認為對我來說關鍵性的社會化經驗發生在人生當中的什麼階段? 童年、青少年時期、還是成年?
4. 我的政治觀有隨著時間而改變嗎? 如果有的話, 這些改變是否反映出新的環境(比方說搬到一個新的地區、轉學或開始一份新的工作)所帶來的新興社會化體驗?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